

## 1981年的抗疫往事

掌故

陈剑飞

2020年春节期间，看着铺天盖地的抗疫报道，谁的心能平静下来？1月28日的一则宁波电视新闻宽慰了我的心：“宁波海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，已于一周内向湖北、北京等地免费发送了一万多个试剂盒。”新冠肺炎暴发，临床确诊最紧缺的就是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，海康公司为抗疫前线及时补充了“弹药”。这条新闻短视频马上在“309班同学聊天群”里热传开来，同学们纷纷点赞。

海康公司总裁余剑伟和我都是恢复高考后的幸运儿，我们在宁波卫校医士班同窗三年，毕业后都分配到了卫生防疫系统。记得我是1980年8月到宁海卫生防疫站报到的，被安排到防疫科，分管肝炎和肺结核这两种传染病。由于卫校里读的教材以临床医学为重，流行病学不得不“补课”了。好在当时防疫科主任曹品元是学者型领导，他为科室同事们争取到了多套《流行病学》，精装本厚厚三册，耿贵一主编，1981年4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。这套书成为我近10年卫生防疫行动的“指南”。时隔近40年，其他书不知被我处理掉多少了，唯有这套《流行病学》还在书橱里好好摆放着，它是我一段难忘岁月的见证。

这次新冠肺炎暴发，国务院把它定为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，说明了它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与危害性。甲类传染病有三种：天花、鼠疫和霍乱。依靠牛痘苗的接种普及，天花在全球已经灭绝。鼠疫也



渔村旧影 (资料照片)

叫“黑死病”，在历史上有过三次全球大流行，发生在中世纪的那次，削减了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。我曾看过欧洲的一些城市雕塑是以“黑死病”为主题的，他们至今仍铭记着那场可怕的瘟疫。甲类传染病的最后一种是霍乱，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个年头就遇上了。

1981年8月8日，防疫站化验室在送检的样本里，检测到稻叶型副霍乱弧菌，这一下子让全站职工的心都拎了起来。甲类传染病必须马上报告县政府和上级卫生防疫机构，直至国家卫生防疫部门。我们一边上报疫情，一边追溯样本。了解到病人是一位船老大，8月7日在出海渔船上发的病，反复上吐下泻，严重脱水，临床症状符合霍乱的诊断。我身处防疫科，当然冲在一线。在科长的带领下，我们当天迅速赶到病人所在的渔村。经流行病学和接触史调查，这个病人是直接乘船回家，中途没有停留，也没有和其他村民有过接触，于是划定整个院子为疫点。先把病人迅速

隔离，搬到村口外的海堤边，在一间独立的闸门管理房里施行输液救治。抢救病人的活，由科室里既有临床经验又有防疫实践的老医师们干了。我是新手，分配到的任务是到病人住家和疫点进行消杀作业。

盛夏时节，天气闷热，整个小渔村的空气里弥漫着海腥的味道。我穿着简单的防护服，戴上口罩，套上橡胶手套，先用苏尔消毒液把病人家里的家具，全部抹了个遍，再和同事们一起对疫点的地面喷洒漂白粉液。那时还没有背包式喷雾器，用的是单管筒式喷雾器。两人扛一木桶，喷雾机插到木桶消毒液里。我在后面叽叽咕咕地不断抽动着喷雾器，同事在前头喷洒，对整个院子角落彻底地进行消杀。又沿着村庄道路对外环境进行了喷洒杀菌，所有水井里投放了漂白粉。地面处理好后，接着对付天上飞的，在全村开展了灭蚊灭蝇活动。隔离点里的住户被暂时限制了自由，但他们非常配合，自觉服用抗菌素，在粪桶里投放杀菌剂。隔离

点由民兵轮流守着，住户所需生活用品也由守护民兵转送进去。

当时是鱼汛时节，原本应该热热闹闹的小渔村，由于疫情一下子切换到了“静音模式”。村民们也弄不清是什么传染病，反正知道很严重，谁也不敢乱串门。我们在村里进行环境消杀作业时，一路上看不见人影，只有几头猪在高低不平的村路上大摇大摆晃悠着。路上的猪粪一堆一堆的，颜色却是墨绿墨绿的。我觉得好生奇怪，悄悄询问同事。他告诉我，这里猪的喂食饲料是海苔。至今回想起来还有些怪怪的感觉。

我们持续对村环境进行消杀，忘记做了多少天，每天汗流浹背，反正那时年轻，干活不觉得累。直到隔离点里的村民两次粪检为阴性，村庄的阴沟、水井、稻田里的水样经多次抽检全部为阴性后，才解除隔离。病人则转送到县人民医院传染病房救治，最后痊愈出院。

由于患者是输入性病例，经及时隔离与环境消杀后，疫情得到控制，没有发生传染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霍乱病例的防疫工作，印象特别深刻。当年全县其他村落也有霍乱零星发生，但在我们有力的措施下，霍乱没有蔓延。只记得1981年的整个夏天，每当疫情警报拉响时，防疫科就冲在最前面。当时的消息还属保密，不像现在由政府向全社会发布。在我们防疫站内部，把霍乱叫作“二号病”，没有直呼其名，而是把它转换为一种代号。

一晃快40年了，我已换了多个工作单位。如今，看见全国上下合力阻击新冠肺炎疫情，看到那些戴着口罩名字写在后背上的临床医生和防疫战士，又让我回想起那段曾经的抗疫岁月。

回味

崔海波 文/摄

2003年春天，“非典”疫情笼罩大江南北，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公布了“八味中药防非典”。药店里的相关中药在短时间被抢购一空，没买到的人慌兮兮的。父亲淡定地说，不急，村后的大山就是一座中药库。父亲种地之余，常常研究中医，家里有不少中草药的书。

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末，我跟着父亲上山去采药。山间四月，草木葱郁，鸟语花香。沿着熟悉的山道行走，听着父亲介绍一些草药的名字及功效，感觉大自然就是一间课堂。遍野的植物，认识是宝，不认识就是草。转过一道弯，我看到了一株金银花，藤和叶子恣意铺展在坡地上，有圆桌面那么大，白的花和黄的花开得很是热闹，所谓“花团锦簇”，大概就是眼前的景象了。我欣喜地凑近前去，发现藤蔓上还有很多花蕾，娇嫩可爱。这么多花，一朵一朵地摘起来太费时了，父亲递给我一把镰刀，叫我连藤带花和叶子全部割来。他说，金银花的藤和叶子，也可以煮茶喝。

林间土地肥沃，千百年来，树叶落下腐烂成泥，踩上去软绵绵的。北坡阴湿，林下有很多鱼腥草。鱼腥草植株矮小，叶子正面是绿色的，背面为紫色，茎也是紫色的，叶子形状与番薯叶相似，只是小了一号。我将它连根拔起，甩掉泥土，放进篮子里。鱼腥草的根是白色的，一节一节，节头上有细细的须。鱼腥草具有清热解毒、祛痰止咳等功效，它也是村民们餐桌上的一道美味。

相传，越王勾践落魄，又逢罕见的荒年，为了和百姓共渡难关，他曾翻山越岭寻找可以充饥的野菜。亲口尝野菜过程中中毒三次，最后发现一种生长力特别强、割了又会抽芽的野菜可以食用。越国人就靠它度过荒年，这种野菜就是鱼腥草，据说鱼腥草的名字也是越王给取的。鱼腥草有一些别名，什么“猪鼻孔”“摘二根”等，不过我觉得还是鱼腥草这个名字最美。

鱼腥草回家后，茎叶剪下洗净，加点油盐酱醋，就可做成一盘凉拌菜。它还有炒、炖、煮等多种食法，晒干后烤肉也很好吃。

剪下的鱼腥草根埋进小屋边的一块泥地里，它的生命力很强，根系也发达，第二年春天就生发出一丛丛一簇簇的嫩芽。几年之后越长越多，现在已成相当规模了。这些年，每当春夏时节，父母进城来时，总会给我带一把鱼腥草。

记得那次上山，我们还掏来很多“狼鸡根”。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用两种动物的名字合起来命名一种植物。狼鸡就是蕨，嫩时像婴儿拳头一样卷曲着，可以当菜吃，老了叶子舒展开来，最适合当柴脑。过去，初夏时节有一项很辛苦的活儿叫割柴脑，将山野里的柴脑割来，盖到西瓜地里。它的作用一是避免西瓜秧被晒死；二是固定西瓜藤，免得被台风吹折；三是减少烂果及虫害。据我的经验，狼鸡是一种很件东西。

过去，珠算是一种实用的职业技能，因此在家庭教育中少不了它，哪怕是贫寒门户，也要竭力引导小儿“写大字”“打百子”。“打百子”是珠算里一道著名而简单有用的练习题，即要求在算盘上把自然数从1加到100。“打百子”目的不是追求它的总和，而是通过“打百子”训练，掌握熟练的指法和牢记珠算加法口诀。

除了“打百子”外，练习加减法的还有三盘成、九盘清、百子图等，练习乘除法的有狮子滚绣球、凤凰展翅等。

20世纪末21世纪初，银行取消在招工、定级和业务比赛中对珠算的测试和考核，这意味着珠算的辉煌年代已告结束。不过，算盘和珠算依然受到部分人的喜爱。

慈溪鸣鹤的珠算教育远近闻名。2019年6月，在一些“神算子”的指点下，我到鸣鹤采访了“神算子老师”和“小神算子”。在鸣鹤幼儿园，我观摩了8名幼儿的珠算演示。而鸣鹤小学是浙江省珠心算教学示范学校，学校花园正中耸立着一尊铜雕，展现的是男女同学的憧憬之态，其中女同学手托一架15档算盘指向苍穹。这一雕塑凸显了鸣鹤小学的特色和成绩。

看完10名小学生的珠算演示后，我请教老师：珠算在今天意义何在？老师答：打算盘需要脑、眼、手的密切配合，是锻炼大脑的一种好方法。让珠算和心算、笔算结合，能提高人的运算能力。



贝母花

## 十七年前，上山采草药

不错的柴脑，它的叶子宽大大，覆盖面广。在四明山区，狼鸡比较常见，我们很快找到一大片，父亲拿起锄头，掘起很多条狼鸡根。

狼鸡根有清热的作用，在防“非典”的日子里，母亲每天烧一锅狼鸡根汤，全家老小一起喝。她还会另外灌一大壶送到哥哥的工厂里，请工人们一起喝。

我们樟村是“浙贝之乡”，最常见的草药是贝母，贝母有止咳化痰的功效，一直以来，人们只取其鳞茎入药。为了提高产量，每当三四月间，贝母开花的时候，农人习惯把花摘掉，让养分全都供应地下的鳞茎。摘下的花扔在路边地头，任其腐烂变肥料。2003年春天，“非典”疫情最为严峻的时候，村前屋后的农田里，贝母花开得很盛，大家突然意识到了它的价值所在。同时还发现贝母花原来也是很美丽的，淡黄色的，像只小酒盅。在笔直的茎上开出五六朵七八朵花，最灿烂的时候也保持着花儿朝下的姿态，曼妙风情深藏不露。那年，贝母花摘下后不再被弃之路边，大家将它收集起来泡茶喝。因为一时间等不到地底下的鳞茎长大，而贝母花也能止咳化痰，虽然效力稍逊于鳞茎，但聊胜于无。

咬文嚼字地说，本文介绍的算盘全称应为“中国有梁有档穿珠算盘”。在世界各种古算盘中，中国穿珠算盘是最先进的，人们往往将它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提并论。

## 算盘越千年



广东恩平市骏马村里的一架算盘



陈列在苏州南京巷钱庄的异形算盘



慈溪市鸣鹤中心幼儿园的老师们给“小神算子”作测试



早年生产队算账的赵叔

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先进的“有梁有档穿珠算盘”究竟起源于何时？众说纷纭，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：东汉南北朝说、元末明初说和唐宋说。

一些清代数学家主张东汉南北朝说。据载，当时已开始把涂有不同颜色的算珠放在刻着弧槽的木盘内，运算时算珠在弧槽内移动，算珠中无穿档的孔。但另一些学者认为，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记数工具或者只能做简单加减法的算板，因此它只能称为穿珠算盘之前身。

清代学者钱大昕等人主张元末明初说，即算盘出现在元代中叶，到元末明初已普遍使用。其主要依据是：在明朝永乐年间编的《鲁班木经》中，已有制造算盘的规格、尺寸之记录；还出现了徐心鲁《算珠算法》、程大位《直指算法统宗》等著作。另外元末的文学、戏剧作品中也提到了珠算。因此，算盘在明代已被广泛使用是无疑的。

随着新史料的发现，又形成了算盘起源于唐、流行于宋的第三说。其依据是：宋代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一家药铺柜台上放有一架穿档算盘；在河北巨鹿县挖掘到一颗出于宋人故宅的木制有孔算盘珠；在元人谚语中已有“算盘”的词语；元代的蒙学看识字课本《相对四言》中，有一幅九档算盘图……较多的算学家还认为，算盘之诞生应可上推到唐代，理由是唐代中叶出现的一些算法是缘于有梁穿档算盘的使用，由此创立了“唐代始创算盘”的

学术观点。总之，现代式有梁有档穿珠算盘的历史已越千年。

现存传统算盘的形状以长方形为主，周为木框，内贯直柱即“档”。档多为小竹杆，档数总为奇数，一般从9档至15档的居多，所谓“13档算盘档档算进”，已属“强硬”算盘了。41档算盘是我所见最长的，能适于多人并列操作。档中横以梁，梁的上部每档有2粒木珠，每珠作数“5”；梁下每档有5粒珠，每珠作数“1”。若按13档计，这一架算盘共有珠91粒，其计算能力超越亿数。

除了长方形算盘外，还有少见的圆形、扇形、拱形、筒形、宝塔形等异形算盘。

传统算盘材质多为木质，其中杂木属低档材质，梨木、松木、沉香木、柏木属中等，紫檀、花梨木等为上品。除了木质外，金、银、铜、铁、玉、象牙、水晶、大理石等材质的算盘也偶有所见。

现在，传统算盘已成了收藏品。清代以前的算盘属罕见，流传至今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。异形算盘因为其工艺考究、妙趣横生，深受藏家追捧。

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，我读小学五六年级，学校开设有珠算课。小学生用的大多是9档算盘，算盘大大无法放入书包，我们就在算盘两端系上带子，这样就可像书包一样背着上学。为了在运算时便于定位，几乎每位同学在算盘的横梁上贴有一条白纸条，上面写着“个、十、百、千、万”等字样。纸条易被磨损，我干脆将这些字刻在横梁上。

我不喜欢算术课，当然珠算课也不例外，因此算盘“笃”不快，母亲

常笑我“笃算盘像搬二尺磨”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偏偏我进了银行工作。银行真是算盘的“海洋”，不消说柜面，合子上摆着算盘，就连各科室也人手一架。“老银行”平时交谈也离不开算盘，说着说着就在手边的算盘上拨几下，以助语势。我们银行过去一直强调“三铁”信誉——“铁款、铁账、铁算盘”，意为银行的钱款、账目、数字是绝对信得过的。

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算盘开始从银行的柜台上撤离，逐步代之以各种计算器，特别是须用乘、除法的利息计算，计算器更显现其优势。但那时在招工、定级和业务比赛中，仍保留着珠算的测试和考核。那时的算盘已做了大的改进：材质改为轻质金属和塑料；梁上每档的2珠减为1珠，梁下每档的5珠减为4珠；珠的剖面由椭圆形改为菱形，这样减小了珠的厚度，更利于拨动；安装了清盘装置，只要按下框上的按钮，就能使全盘算珠恢复到原状，即清零。改进后的算盘更轻巧、牢固、好使。后期的年轻员工都选用这种新型算盘。

用算盘来计算称“珠算”，珠算能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及简单的开平方和开立方运算。珠算对各种运算都有对应的法则，统称“珠算法则”。在法则下，人们总结出许多计

甬城绘·博物馆



## 宁波茶文化博物院

宁波茶文化博物院简称“茶博院”，坐落在月湖景区花坞上的清代官邸袁宅内，庭院优雅清幽，为市级文保单位。茶博院是宁波对外宣传茶文化的窗口，主要功能为展示宁波的茶史、茶事、茶叶、古茶器及相关古董、艺术品，并进行茶文化相关的研究推广、互动体验、学术交流及培训等。

(丁安 绘)